

José María Álvarez 的 《福爾摩莎，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第二章

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在福爾摩莎的傳教第二節

吳孟真、李慧珍、李毓中*

José María Álvarez 的《福爾摩莎，詳盡的地理與歷史》第二章第二節

第二章西班牙道明會傳教士在福爾摩莎的傳教

第二節

慈善事業(Obra Pía)設立 - 艾斯奇維神父(P. Esquivel)的日本行以及在途中遭遇不測；他的一生。 - 瘟疫時為許多兒童受洗 - 新教區的設立 - 路易士·慕洛神父(P. Luis Muro)死於野蠻人之手 - 棄守淡水和傳教士士氣的頹喪 - 荷蘭人佔領雞籠以及傳教士被囚禁送往巴達維亞(Batavia) - 之後利崎神父(Victorio Riccio，維克多利歐·利崎，或譯為李科羅)發現島上仍保有信仰虔誠的基督徒；1673年重振福爾摩莎傳教區的企圖。

自傳教士們開始他們的傳教工作，在短短幾年間他們所獲得的成果是不容輕忽的，雖然在質與量方面都不能說取得了豐富的成就，但是這些都是可預見的遠景。「聖慈悲兄弟會」(Hermandad de la Santa Misericordia)的設立，就是該傳教會初期生命力與幹勁表現的最佳佐證，在幾年間傳教士們便籌劃完成此一偉大的計畫，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在未來提供福爾摩莎島所需的傳教士，在中國和日本亦非常需要傳教人員。

這項成就要歸功於艾斯奇維神父的熱誠，阿杜瓦特(Aduarte)主教閣下曾為此事做了以下的描述：「在日本境內天主教光榮殉教的那段時間(譯註：指日本禁天主教及迫害天主教)，福爾摩莎島長官優良的騎士胡安·德·阿卡拉索(Juan de Alcarazo)先生與艾斯奇維神父在互相溝通後，便決定在福爾摩莎島上成立一個「聖慈悲兄弟會」。為此胡安長官拿出四千匹索，而哈辛托·艾斯奇維神父則拿出馬尼拉教徒們所捐獻的二千匹索，這筆錢本來是要在這片新

* 李毓中現為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博士候選人

皈依的土地上，做為慈善事業經費使用。於是靠著這筆六千塊匹索，此一「聖兄弟會」(Santa Hermandad)有了開始，該地所有人士的最高長官(Cabo Capitán General)按例永遠是該兄弟會的會長(Hermano Mayor)，島上正直人士們則被指定為代表，並由他們指定他們過世後的繼任人，由於我們的修道院院長(Peraldo)參與了所有的籌備規劃活動，因此此一聖兄弟會得以順利地成立。另外，我們準備了一口配有三把鑰匙的箱子來存放這筆經費，三把鑰匙中的一把交由此地的最高長官也是該兄弟會的會長來保管，一把則是由修道院的院長收藏，另一把則交由代表中的某一人保管」。在制訂章程、劃分職權以及宣誓完成後，這些文件呈交給馬尼拉大主教簽署，由於他的簽署使得此島有了精神上的歸屬，此一兄弟會的設立變得更完備。這一切也使得這片土地獲益良多，並對此賦予莫大的期望，特別是如果能在這些章程的管理下設立一個神學院(Seminario)，以便有能力的中國、日本以及這片土地上其他族群的兒童們得以接受我們的基督教信仰，以及在拉丁文、藝術及神學上獲得良好的教導，這將有助於這些國家的皈依天主教，而這也正是那些善良的傳教者所深切需要的。

「總而言之，福爾摩莎島是最合適的選擇，因為該島離大中國是如此的近，而距離日本也不遠。」¹

這項工作，憑藉著艾斯奇維神父個人的宗教熱誠和決心方得以推展，但一直到1632年設立該神學院一事卻始終無法達成，此事影響甚大，所有奉派的傳教士都一致關切此事，如同福爾摩莎島傳教士之一奇洛斯神父(P. Quirós，譯註：全名為Teodoro Quirós de la Madre de Dios)在1639年寫道：「閣下(V. R.，譯註：Vuestra Reverencia，通常用來對神職人員的尊稱)相當明瞭由於旅遊

1 阿杜瓦特(Aduarte)主教閣下所著之*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parte I.^a, lib. 2.^o, cap. XLVI。

支出費用太高的緣故，而使得西班牙的傳教士相當缺乏，而中國和日本等地急需許多傳教士，因此才會在這些地區為當地人興建一所學校，受完教育後能力可以的則成為神職人員，能力不足的則可以成為教義的勸說者；由於原住民孩童的父母們可以時常在攜帶商品銷售謀生計的途中，順便來學校探視子女，感覺孩子們如同住在家裡一般，因此這些父母也容易同意讓他們的小孩子們以校為家」。²

在寫完這些敘述後三年，福爾摩莎島淪為荷蘭人所有，而這一高尚的願景也因此幻滅，只在那些心懷上帝的聖潔人們心中留下無數高尚的理想。

我們先前已見到艾斯奇維神父自他到達福爾摩莎島後，在雞籠和淡水地區努力不懈地工作的情況，但他到該島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要留在臺灣，而是為了在那裡等待日本政府迫害傳教士風聲鶴唳的時間一過，便趁適當時機潛往日本，但此時的日本政府正用盡各種辦法，阻止傳教士們從別的管道進入其境內，因此艾斯奇維神父只得繼續留在臺灣等待時機。

由於前往日本困難重重的原因，為了讓他自己不致閒散無所事事，艾斯奇維神父決定開始學習原住民的語言，在短短的時間內他便對此語言運用自如並藉此執行傳教任務；還寫了一本內容豐富用來瞭解原住民語言的書名為「技藝」(Arte)，此外，並將基督教義的書籍翻譯成原住民語供原住民使用。

如我們所見，艾斯奇維神父也廣受當地野蠻人們的愛戴，當艾斯奇維神父告訴這些原住民說，不論是他自己還是其他主所派來的傳教士都是不近女色的時，原住民們一開始認為他是騙子，後來直到發現神父們在對待婦女一事上皆特別小心避免時，才相信他所說的是真的。當艾斯奇維神父第一次向這些誤入歧途的原住民們佈道談到人死而復生一事時，「而這些原住民們卻說

² 見附錄第一封信，註釋。

，我們死去的親人一直躺在他們的埋葬處」。

西班牙人相當欽佩艾斯奇維神父的高尚志業，他在短短時間內便興建了三座教堂與會所(casa)，由於該精神導師使得許多靈魂因領受聖洗禮(santo Bautismo)而重獲恩賜生命。即便如此，艾斯奇維神父依舊期盼獲選的靈魂能有更完整的奉獻，因為他認為他的傑出成果在上帝面前仍是不夠的。

日本德川幕府將軍(Siogún Yemitsu Tokugaua)對十字架的崇拜者(譯註：指天主教徒)和傳教士們迫害的駭人聽聞，並沒有辦法威嚇艾斯奇維神父的信念，反倒更鼓動其殉教的意志；因此，他在福爾摩莎島等待近三年的時間後，決定把握這一展現他對主信仰的機會，在沒有取得任何忠誠承諾和不確定是否遭欺騙的情況下，仍義無反顧地與一位方濟會的神父登上一艘中國舢舨前往日本。

他們自雞籠港啟航，在航行數日後，當船航行至深海時，利益薰心的中國船夫心懷異念，決定要謀害這二位神父。在1633年8月9日他犯下這卑鄙的惡行，在割下他們的鼻子和耳朵後，叛徒將兩位神父的屍體拋向大海，然後將神父們的耳鼻用鹽醃漬起來以獻給長崎的最高當局(Tono de Nagasaki)，希望因為他的「偉大罪行」而獲得獎賞。這個惡人是得到了獎賞，但沒多久就把獎金全賭輸了，然後如同上帝慣常對迫害基督之名的人們所施予懲罰的跡象般死在血泊中，為他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這位令人崇敬的神父其特殊美德，雖然已在上帝面前獲得了他長久渴望的「殉道」榮耀，但仍然令人們對其悲劇性的死亡唏噓不已。他出生於維多利亞(Vitoria，譯註：該城市位於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區)城的一個顯赫之家，在道明會發願後，由於他出色的才智，而被選派前往瓦亞得利(Valladolid，西班牙中部卡斯提亞－雷昂地區的重要古城)的聖·葛利果里歐(San Gregorio)進修，直到1626年，他再也無法遏止自己前往當時遭受極端迫害的日本教區奉獻熱血的意念，才出發前往菲律賓。

在馬尼拉大學(Universidad de Manila，譯註：應是指現在的聖特·多瑪斯大學)的四年時間裡，艾斯奇維神父一邊教授神學，一邊致力學習日文，並在日本人且之後亦是著名殉教者的哈克·伯德·聖瑪莉亞(Fr. Jacobo de Santa María)閣下協助下，完成日文－西班牙文字彙(*Vocabulario Japón-Español*)這部鉅作的出版。他對上主的熱愛以及救贖靈魂的所有的熱忱，還有他嚴謹的苦行生活，都是這位福爾摩莎島上傳道者廣為人知的德行。即使他沒有像其他在日本的教會兄弟一般遭受火刑之苦、活埋之痛或是其它刑罰，他也會以我們前面提到的激進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朝著殉道者國度邁進。

如同當時文獻所告訴我們的，主的信仰不僅是擴展至雞籠和淡水西班牙要塞附近的原住民之間，連今日島上的首都台北(Taihoku)平原，在流經該平原的淡水河兩邊所有的無數原住民聚落的人民也都信仰主。但是，由於不同原住民之間的敵意，仍繼續地代代相傳而使得傳教士的工作益發困難，神父們若到其他的某些部落布道，將會招到另一些部落的仇視和反感，並對西班牙人與已臣服西班牙的原住民聚落之間的友誼感到深惡痛覺。

當1634年軍曹長(Sargento Mayor)阿隆索·賈西亞·羅美羅(Alonso García Romero)抵達台灣成為雞籠的殖民地長官(Gobernador)後，他在短短一年多的任期內，憑藉著其公正良心，獎勵忠誠者懲罰叛逆者，「使得惡人心懷警惕而善者寬心不受傷害，人們對他又敬又愛，願意納稅給我們的國王」。

阿隆索·賈西亞·羅美羅對信仰的虔誠甚至還凌駕於他的勇氣之上，因此「他對救贖那些可憐原住民所投注的關注，並不會少於力振國王榮耀這件事」。他協助傳教士的善行，使得他們的工作可以擴展至許多偏遠的村落，甚至遠到一些原先不被允許抵達的地方。

「在當時，」奇洛斯神父記載「主將原先與原住民之間關閉起來的對話都開啟了，因此許多原住民接受受洗；僅僅我一人，在那裡眾多神職人員中最卑微的人，在有天花肆虐的那年，僅八天的時間內我就在淡水河為320名原住

民受洗，而在聖地牙哥(Santiago，譯註：指今日的三貂角一帶)地區，五天內就替141名原住民施洗，而且沒有西班牙人相伴，僅僅只有一、兩個原住民男孩為我攜去做彌撒的訊息，無懼地在殖民地長官恐懼且制止前往具有敵意的聚落間行走，若此時馬尼拉方面能增派人手來支援，很快地整個福爾摩莎島就會恢復平靜且臣服於我們，而這些原住民將是我們主的榮耀皈依其聖誠，而國王則可因他們的稅賦獲益而省去開銷，如同人們所言的，目前我們在那裡只有花費而不知獲利」。³

不只是兒童，分散於淡水河兩岸，被稱為Pulaguan、Camaco、Manpe、Senar、Paracucho以及其它聖徒殉道者，路易士神父(Fr. Luis)曾造訪過村落的成人們都要加入主耶穌的行列。而在島的東部海邊一處我們稱為聖地牙哥(Santiago，譯註：三貂角)及位於日本人統治下稱作蘇澳(So-o)或宜蘭(Giran)海灣裡的聖·羅倫索(San Lorenzo，譯註：今日蘇澳港灣)都設有小教堂及會所以供傳教士居住。

1635年在馬尼拉所召開的教區會議(Capítulo Provincial)上，在聖地牙哥聚落所興建的聖特·道明哥(Santo Doming)教堂和屋舍獲得承認，在同一領土上駐紮地也獲賜名為聖·羅倫索。無庸置疑地，傳教工作日益興盛，有許多地方被奉獻給天主，就是這樣的行為榮耀了上主；如同熱心的奇洛斯神父在1639年所寫的信上所到的：「在教堂會所服務的我，由於沙巴里(Taparri)的教堂如同其它四個位於河岸的教堂般遭原住民放火焚燒，儘管我知道庇護我們的是玫瑰聖母(Rosario de la Madre de Dios，或譯為聖母羅沙里歐)，但若不是我所在的屋舍是石造的，那麼可能我和我們的教堂都會被祝融所毀，因此在這裡我每日和原住民們齊聲祈禱。」⁴

3 見附錄第二封奇洛斯神父的信件。

4 見附件。

這些犯下如此踰矩罪行的原住民，他們是西班牙人以及與西班牙人友好原住民的敵對者，而也就是這同一批原住民，再次地用和平使者路易士·慕洛神父的血染紅了他們的手。

據文獻記載，約三十名人員在奉殖民地長官的命令前往淡水平原購買稻米時，卻在回程遭到攻擊而喪命，這些原住民埋伏在這三十名人員必須經過的山丘附近，然後突然射出近三百發的箭，幾乎所有前往乘船處的人們都喪命在致命武器下，慕洛神父也不能倖免，這些野蠻人玷辱了神父顫動的軀體，並且將他的頭、手和腳砍下，做為其罪行的戰利品帶走。

事實上，這場駭人聽聞的殺戮並非是針對天主信仰的直接反應，儘管如此，由於傳聖道者們對救贖他人的熱情和期盼見到眾人熟知與崇拜的聖名上帝，他們仍冒險地參與此一不幸的外勤工作。事實上，由於Senar的原住民所犯下的罪行導致法蘭西斯可·德·聖特·多明哥(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神父的死亡，而這些兇手因為預期西班牙人會進行嚴厲的懲罰而害怕地逃離所住地，進入現在的北投(Pak-tau)(日本人稱為Hokuto)地區。然而，神職人員為了要解救這些原住民的靈魂，渴望他們能過著基督徒的生活，而決定忘了這些原住民曾對他們造成的莫大傷害，從殖民地長官那兒為這些原住民取得一份特赦令，讓他們早日放棄山上的住所，回到原本居住的老家。儘管很多原住民已經獲得熱心傳教士們的慈愛忠告，但是仍有一些原住民家庭不願前來，而慕洛神父希望能把握所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教徒，因此他認為與士兵們一起去找尋糧米供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一方面可以結束已經進行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阻止士兵們以暴力欺凌原住民的行為，而使先前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諸流水，而此一引導這些原住民來到主恩典前的純潔仁愛企圖，卻使得他們喪命於這些可憐原住民的手裡。箭在穿透慕洛神父的心臟前，先穿過刻在他身上的耶穌聖名，西班牙人花了十二天才取回慕洛神父未腐化的屍體，並在其遺體抵達淡水碉堡時以禮炮來加以迎接，我們的主以這樣的方式來讚揚

其謙卑的僕人。慕洛神父之死發生在1635年3月底的時候，正好是法蘭西斯可·瓦艾斯·德·聖特·多明哥神父光榮殉道滿三周年的日子，慕洛神父與瓦耶神父一同被葬在淡水的小山頭上，該處亦是西班牙駐軍孤立小要塞的所在地。

先前就提到，新的菲律賓總督塞巴斯提安·巫它度·德·科奎拉(D.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於1635年抵達馬尼拉，自他抵達菲律賓群島起，他就對福爾摩莎島的殖民事務感到興趣缺缺，想當然爾，對那裡在良好軍事成果支援下已建立起的傳教事業亦是如此。這個新菲律賓總督嚴禁任何傳教士離開菲律賓前往日本，並寫信給福爾摩莎島上的長官帕羅密諾(D. Palomino)說，要這些傳教士們其靈魂效法使徒們(Apóstoles)一樣安貧守貞(sine virga et since pera)，並且在他一上任後，就以經濟上的理由廢除馬尼拉、甲米地(Cavite)、福爾摩莎島和德那第港(Ternate，譯註：或譯為特爾南特島，位於摩鹿加群島)等地要塞所有小教堂神父職務⁵，完全沒有考慮要鞏固已成為西班牙領土的福爾摩莎島，卻又開始花費巨大開銷在和樂(Joló，譯註：或譯為約羅港，在蘇祿群島)和棉蘭佬(Mindanao，譯註：又稱岷答那峨，菲律賓群島南端)的戰事上，此外要該島已經夠稀少的駐軍介入危險的探勘活動，用這樣的手段近乎是將福爾摩莎島完全遺棄不要。不久，在1638年時，塞巴斯提安·巫它度·德·科奎拉下令摧毀淡水要塞放棄該據點，這一行動不僅使駐守福爾摩莎島的數量已經相當稀少的駐軍為之士氣低落，這一嚴重的打擊亦使得傳教士的努力完全被抹殺。在西班牙人這樣的命令下，不久的將來傳教士們的志業逐漸消逝結束，而他們那些原本未來可以成果豐碩的傳教使命也化為烏有。

5 Archivo de Indias, sección filipina, legajo 30.

「由於阿龍索·賈西亞·羅美羅對福爾摩莎島島上人數最多、最先進和最勇猛的噶瑪蘭(Cabarán)地區原住民施予嚴厲的懲罰，而使得他們變得膽怯，因此法蘭西斯可·加西亞(P. Fr. Franciso García)神父得以順利進入該地傳教，並在天花肆虐的時間為許多人施洗。之後我也因此得以在該地來回，在8天內替186個六歲甚至更小年紀的孩童們施洗，當我想繼續我的工作時，一封從(聖·薩爾瓦多)要塞寫來的信上說，菲律賓總督準備要所有福爾摩莎島上的西班牙人撤離該地，我考慮到此地將不會再有任何傳教士、也不會有西班牙人留在福爾摩莎島，所以我沒有再替任何人施洗；自此開始，島上不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情況都跌到谷底，只剩下我們轄下的兩個皈依天主教村落，伴隨著主的話語溫馴如綿羊」。⁶

這事發生在1638或1639年之間，至此不再對馬尼拉運來援助以對抗荷蘭人一事抱任何希望，而這些荷蘭人無時無刻不為攻擊基隆一事進行準備，而使得基隆一地的人們終日懷抱著與日俱增的惶恐憂心。傳教士對這些原住民的未來，感到同情與悲傷，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布道與施洗工作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卻在不久即可到達此目標時被迫放棄；另一方面「遺憾看到如此多的天主教靈魂被迫在崇拜偶像的異教徒統治之下」，而這些人已經認知到主的信條。

在西班牙人統治福爾摩莎島這十六年間，究竟有多少受統治的福爾摩莎島原住民受洗成為教徒不得而知；然而根據有傳教士進駐的村落和他們所寫的報告中確實的數據來研判，或許其人數大概可達四千人左右。

事實上，我們轄下的兩個皈依天主教村落，伴隨著主的話語溫馴如綿羊的村落「是Camauri和Taparri，這兩個村落相當接近西班牙人與傳教士們的常駐

6 見附錄第二封奇洛斯神父的信件。

地」；這些都是西班牙人最初的傳教地點，而根據艾斯奇維神父的敘述：「Camauri現在由4或5個聚落組成，約有六百位原住民；而Taparri係由4或5個村落組成，人數合起來約有一千人左右」。Kakinauan或是稱為聖地牙哥，是一個約有六百名原住民的聚落，並蓋有一個名為聖特·多明哥的教堂，雖然這些聚落的原住民並非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但約略估計教友也已有兩千人。在聖·羅倫索和其他噶瑪蘭地區的聚落裡，也有為數眾多的天主教徒，法蘭西斯可·加西亞(Francisco García)神父和奇洛斯神父在該處為許多的小孩施洗成為教徒，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現今的台北平原一直到有西班牙駐軍的淡水河河口一帶，「聖殉教者路易士神父所曾去過的Palaguan、Camaco、Manpe、Senar、Paracucho)等地方，也有許多天主教徒」，根據這些，據信教友人數應可達四千人，這同時也證明了在那遙遠美好的時代，我們的豐碩傳教成果。

被派到福爾摩莎島的傳教士人數眾多，⁷但是由於傳教士們可以輕易地藉由此島轉往日本或中國去播送新的福音，使得許多真理工作興致勃勃的傳教士僅僅將福爾摩莎島視為前往這些帝國傳福音的一個跳板，因而導致福爾摩莎島上的教化工作變得有些許遲緩，而這些傳教士在臺灣北部所停留的時間，短到幾乎只夠他們學會原住民的語言，根本不可能展開傳播福音的工作。

1630年，安赫·古奇(Angel Cucci)神父和多馬士·西耶得拉(Tomás Sierras)神父以菲律賓總督使節之名，從基隆出發前往中國，希望跟福建總督(原文寫作Virrey，為副王之意)建立貿易關係。他們帶給福建總督一套銀餐具做為見面禮以及表達希望日後能在中國土地上宣揚耶穌基督之名的相關公文。

最後這一出使行動並未達成，因為多馬士·西耶得拉神父和他的一些同伴不幸地死於所搭乘船隻的海盜船東之手，但是古奇神父和一些中國人卻奇蹟

7 見參考附件的清單。

式地獲救，乘坐一艘由上主駕馭千瘡百孔的船隻抵達岸邊。最後，古奇神父一行人在歷經中國當局的多疑所導致的諸多波折後，終於得以開始展開傳教工作且進展順利，甚至最後順利宣揚天主教到今日的福安(Provincia de Fogán，譯註：或指福建)地區。

1633年之後被派往福爾摩莎島的傳教士狀況比較穩定，有些還一直待到西班牙結束在福爾摩莎島上的統治，而如同所有西班牙駐軍一般的命運，被荷蘭人俘虜而成為階下囚。

1642年8月24日基隆堡壘內的西班牙駐軍在歷經五日英勇卻徒勞無功的抵抗後終於向圍攻的荷蘭人投降，當時在福爾摩莎島上的神職人員有地區副本堂父(Vicario Provincial)奇洛斯·德·馬德列·德·迪歐斯(Teodoro Quirós de la Madre de Dios)、宗教法庭(Santo Oficio)的委員(Comisario)胡安·德·洛斯·安赫列斯(Juan de los Ángeles)、在福爾摩莎島上已有一棟屋舍的方濟會神父歐諾佛列·德·赫穌士(Onofre de Jesús)，以及一些企圖在福爾摩莎島建立據點以作為前往中國傳教工作跳板的奧古斯丁會傳教士；修士則有佩德羅·盧易斯·德·羅莎利歐(Pedro Ruiz del Rosario)、巴西里歐·塞萬特斯·德·羅薩里歐(Basilio Cervantes del Rosario)和奉獻者(Donado)阿瑪多爾·德·阿庫聶(Amador de Acuña)，他們都是道明會的成員。他們被當作戰俘最初先被送往福爾摩莎島西南方的大員港(Taiuán)，在這兒他們遇到一年前從中國前往福爾摩莎島途中被荷蘭人俘虜的道明會神父佩德羅·恰維斯(Pedro Chaves)、之後不久，所有的俘虜又都被送往巴達維亞(Batavia)，他們在1642年11月底抵達該地，在悲慘的牢獄期間幸而仍受到良好的對待。

這些神職人員僅在該地以俘虜的身份遭到扣留約一個月的時間，便因為找不到對他們不利的證據而獲得荷蘭人的釋放；一回復自由之身，胡安·德·洛斯·安赫列斯、歐諾佛列·德·赫穌士神父與巴西里歐·塞萬特斯·德·羅薩里歐修士，以及所有被俘的西班牙軍隊成員，便馬上準備航程所必須的裝

備，然後搭上前往馬卡薩爾(Macasar，譯註，位於菲律賓群島南方，印尼所屬西里伯斯島)的船返回馬尼拉，再一次獲得他們所渴望的自由。在短短時間內，確實的時間是在1643年2月底，他們就在由這次旅程所有成員要求推選下成為領導者的胡安·德·洛斯·安赫列斯神父帶領下成功啟航，歷經辛苦直到同年的6月29日他們才終於抵達馬尼拉城。

隨著福爾摩莎島的棄守，道明會失去了其房舍、教堂及所有宗教儀式所需器物，甚至連原本為前往中國傳教的神職人員所準備的補給品也無法保有；但這些實無法與失去福爾摩莎島上教友的損失相比較，就像聖塔·克魯司(Santa Cruz)神父所感嘆的一般：「那最讓人惋惜的是，那些原住民、那些親愛的孩童已成為非常好的天主教徒。在福爾摩莎這片土地上，我們辛苦耕耘了十六載，這一時期正好是天主教西班牙軍隊旗幟飄揚的時代，透過我們教會神職人員血汗耕耘以及難以形容的盡心和操勞後，在這兒有無數的人們皈依了主，而主的福音與啟示也終於為人們所知」。⁸

天主教信仰確實是深植在福爾摩莎原住民身上的，而這一事實在完全沒有神父後二十年為道明會維克多利歐·利崎(Victorio Ricci，譯註：即李科羅)神父所證實；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當時受國姓爺的召喚，做為他的特使而奉旨被派往馬尼拉，要求菲律賓群島臣服與他的力量之下。當1662年8月他從菲律賓回航時因為風力的影響而被迫停泊在雞籠，「在入山處出現一群配有武裝攜有弓箭的原住民，大聲地以其母語或以中文或以西班牙文詢問是否有天主教徒登陸？接著並表示他們自己是天主教徒，然後畫十字祝聖並出示他們的念珠…這些原住民就是福爾摩莎島還在西班牙王冠庇蔭下土地時，受到神職人員照管的那些原住民。他們儘管被遺棄而再也沒有任何神職人員照看，但

8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parte I.^a, lib. 1.^o, cap. XV。

仍無視這些瑕疵，繼續保有其基督信仰…。這些原住民天主教徒在沒有神父的情況下生活，但仍可見到受自我們神職人員教導之成功和他們本性之善良，得以保有如此偉大的基督徒品德，代代相傳自修主的律法…一個個互相幫忙施洗。他們保有戒律，念玫瑰經…家裡掛有十字架和他們所保有的聖徒肖像…直到主想起來再派神父給他們」。「當這些原住民天主教徒見到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時，他們紛紛跪在神父面前悲泣他們的孤寂，還有傾訴他們見到企盼許久主的傳道者時萬分喜悅。在舢舨停留在該地為出航作準備的十天裡，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忙著和跟他寸步不離的原住民交談，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原住民來見他，因此每天都忙得精疲力竭。他向這些原住民佈道、盡力以中文或西班牙文聽取原住民信徒們的告解。他替許多由天主教徒父母帶來的兒童們施洗，至於成人受洗的部份，如果他們未能充分瞭解天主教教義者，則不予以施行他們所要求的聖餐禮(Sacramento)，因為此地未停有神父，此舉將有信仰不夠忠誠而有褻瀆神祇的危險。他們悲泣求維克多里歐·利崎神父留下來與他們一同生活，他們會供養他，而在接到命令時，他們會極力服從其指示。但是，由於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手中仍有其傳教的重責大任，而且中國的天主教教友也在引頸企盼他的到來，所以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不得不忍痛捨棄福爾摩莎的原住民離去」。⁹

受國姓爺政權這一方委派的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在他第二次出使馬尼拉後由馬尼拉返回廈門(Emuy，譯註：亦寫成Amoy)的途中被韃靼人(Tártaro，譯註：即滿清)所俘虜。在歷經繁千辛萬苦和諸多不幸，甚至還曾被判處死刑，但最後終於獲得自由，然後搭乘荷蘭人的船再度來到福爾摩莎。他曾經親眼目睹錦舍(Kinsia或寫成kinsie，譯註：即鄭經)的支持者們，如何堅

⁹ 請參考P. Santa Cruz的前述著作，parte 2.^a, lib. 2.^o, cap. XXI。

強抵擋企圖染指廈門的滿清大軍，而當時廈門是屬於鄭經的統治勢力範圍。在這樣的情況下，維克多利歐·利崎神父在雞籠住了近一年的時間，在那裡為舊的天主教徒傳道，直到1666年才因要事搭船前往菲律賓。

又過了幾年，由於道明會傳教士已在福爾摩莎島上傳播福音且奠定良好的傳教基礎，使得至聖玫瑰(Santísimo Rosario，或音譯為聖地西瑪·羅薩里歐)」教區對此地仍念念不忘。因此，在1673年8月1日，阿爾卡迪歐·德·羅沙利歐(Arcadio del Rosario)、佩德羅·德·阿爾卡拉(Pedro de Alcalá)、佩德羅·德·阿拉爾孔(Pedro de Alarcón)和阿隆索·德·科多巴(Alonso de Córdoba)等四位神父從馬尼拉出發前往福爾摩莎，企圖重新匯集在該島分散四處的教友之心；若是他們無法留在該島的話，他們將前往教會兄弟已經獲得豐碩工作成果的福建。通常只需要8天的航行，他們卻在歷經24天的長途疲憊航行後才在大員上岸，受到當時統治臺灣的國姓爺繼承者其子鄭經的極差對待，他不但不接見他們，還派員監視他們並禁止他們傳教，除此之外，甚至蓄意散播謠言說他們是馬尼拉來的間諜，好引起民眾對他們的仇視，在在顯示他不願其臣民皈依為天主教徒的企圖。

這些神父在福爾摩莎島過了四個月毫無任何進展，甚至是被軟禁起來的日子後，當鄭經離開福爾摩莎前往其在廈門的領土，以便與將他圍困在大陸一角的滿清政權展開新一輪的戰役時，這些傳教士們終於可以趁機享有較大的自由，同時也獲得新的空間得以傳教，但歷經不到3個月的時間鄭經便又撤退回到了福爾摩莎島。在這段期間，阿爾卡迪歐神父解救了3個不幸囚犯的靈魂，這些人被6根釘子以及不人道的方式釘在公共廣場中，以極為恐怖的方式供人觀賞。在福爾摩莎島待了六個月後，這些神父終於相信他們無法軟化鄭經的鐵石心腸，再加上他們無法找到可以搭載他們前往福建海岸的船隻，於是只好離開此島返回菲律賓。

10年後，也就是1694年10月12日，道明會教區委員會(Consejo de Provincia

de los Dominicos)重新派佩德羅·慕聶斯(Pedro Muñoz)和胡安·阿司徒迪友(Juan Astudillo)神父到福爾摩莎島以便重新開使此地的傳教事務，但這一計畫並未付諸實行，也不得而知為何這項行程沒有進行的確切原因；然而當時滿清政權剛從國姓爺繼承者的手中奪得福爾摩莎島，在這段改朝換代動盪不安的時期，許多不願歸順新政府的移民絡繹不絕地湧向福爾摩莎島，這些足以說明了該段歷史最後為何無聲無息的原因。自此，結束了道明會長達一個半世紀在福爾摩莎島建立教會的努力，而那些原住民天主教徒的後代們重新過著野蠻的生活，在中國人抵達後則被迫遷移到東部的平原，日文稱之為甲子蘭(Kap-chu-lang)或宜蘭的地方。當1860年再度踏上福爾摩莎島的歐洲人，發現這些原住民有很長的時間，仍保有一個虛無的造物主上帝的概念，沒有任何的迷信行為並且習性儉樸，與當時島上其它地區原住民的低俗相比較，完全不同。